

# 人性动机、战争原因与东亚身份政治

——以勒博《国家为何而战?》为中心的讨论<sup>\*</sup>

陈 捷

**内容提要：**战争与冲突的由来是国际关系学科的经典议题。与以往学者不同，理查德·内德·勒博的《国家为何而战?》追问了国家发动战争的深层动机，指出恐惧、利益、地位和复仇四个普遍动机推动国家发动战争，并建立了一个涵盖以往三个半世纪的战争数据库来加以论证。他发现，大多数战争源于国家对地位和复仇的追求，而非由安全或物质利益所驱使。他同时预测，随着诱发战争的主要动机已失去原有意义，未来国家间的战争将会减少。文章着重针对勒博在理论构建和研究设计过程中存在的疏漏与不足提出质疑，指出其对荣誉动机同战争行为的关联，包括个体心理动机与集团行为倾向一致性的逻辑推导不够严谨连贯，同时，在案例选择与数据编码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选择性和主观性。文章还就勒博所强调的激情—荣誉动机对探讨当前东亚地区秩序所具有的启发意义作了引申性讨论。

**关 键 词：**《国家为何而战?》 荣誉动机 战争原因 身份政治 东亚

**作者简介：**陈捷，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

战争与冲突的由来是国际关系学科的经典议题。与以往学者不同，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的《国家为何而战?》将注意力转向

---

\* 本文得到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中国参与国际人道主义干预规范塑造的对策研究”（课题批准号：2013EGJ001）及“上海交通大学文科科研创新基金青年项目”（项目号：12QN13）的资助。笔者感谢陈定定、杨原、陈玉聃、唐世平、邓好雨等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同时感谢《当代亚太》杂志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

《当代亚太》2014年第3期，第47~62页。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Pacific Studies (Bimonthly)

国家发动战争的深层动机。<sup>①</sup> 在他看来，战争的直接目标（诸如消除军事威胁、征服领土等）不过是基础性动机的延伸表达，需要追问的是国家为什么追求这些目标。勒博认为，恐惧、利益、地位和复仇四个普遍动机推动国家发动战争，并建立了一个涵盖以往三个半世纪的战争数据库来加以论证。他发现，大多数战争源于对地位和复仇的追求，而非由安全或物质利益所驱使。他同时预测，随着诱发战争的主要动机已失去原有意义，未来国家间的战争将会减少。该书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推进了有关战争原因的讨论，对原有研究构成了冲击，值得加以关注。

本文将对《国家为何而战？》展开批判性的讨论。由于此书已有质量不错的中译本，故本文对其具体结构、内容与结论将不做过多介绍，而是着重针对勒博在理论构建和研究设计过程中存在的疏漏与不足提出质疑，并就勒博所强调的激情—荣誉动机对探讨当前东亚地区秩序所具的启发意义作延伸性讨论，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 一、探究战争的深层动机：理论构建与实证检验

勒博是国际关系学界的知名学者，其渊博深厚的学识功底与独特鲜明的研究旨趣在学界独树一帜。<sup>②</sup> 近年来，他展开了自称为“三部曲”的研究规划，试图回到古典现实主义传统，以古希腊圣哲对人与秩序的思考为起点，构建一个内嵌于政治秩序理解的国际关系理论。<sup>③</sup> 《国家为何而战？》是其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其基础则是他于2008年出版的《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sup>④</sup>

---

<sup>①</sup> Richard Ned Lebow, *Why Nations Figh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中译本参见理查德·内德·勒博：《国家为何而战？》，陈定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sup>②</sup> 勒博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危机管理与外交决策的心理分析，特别是导致战争发生的情报失误与危机升级问题。最早使其蜚声学界的著作是1981年出版的《和战之间：国际危机的性质》，与理性主导的威慑相比，他更强调其中复杂多样的心理机制，参见Richard Ned Lebow, *Between Peace and War: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84。勒博另一本引起较大反响的著作是其在冷战结束初期与他人合编的《我们都输了冷战》，参见R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Gross Stein, eds., *We all Lost the Cold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sup>③</sup> Chris Brown, “Review: Lebow’s *The Tragic Vision of Politics: Ethics, Interests, and Orders*”, *Political Theory*, Vol. 36, No. 4, Aug. 2008, p. 647.

<sup>④</sup> Richard Ned Lebow, *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中译本参见理查德·内德·勒博：《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陈锴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

《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是国际关系学界近年鲜有的具有范式转移性质的成果。勒博试图基于人性中的普遍要素，发展出一个多层次的政治秩序宏大理论以认识国际关系。在对柏拉图等古希腊先哲思想进行解读的基础上，他区分了驱动人类行为的三个普遍动因：欲望（appetite）、激情（spirit，又译作“精神”或“血气”）和理智（reason）。其中，欲望是指各种欲求，例如对财富的占有；激情则使人产生自尊，推动人追求在同侪和社会活动中获得认可从而满足自我；<sup>①</sup> 理智既是一种动机，又带有工具性，它旨在导向良善生活，节制欲望和激情。理智从未能彻底地调适欲望或激情，相反，可能会失去对它们的控制。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恐惧便会产生。恐惧（fear）是一种情绪，并非人类的驱动因之一，但它是一种强大的次要动机。勒博认为，欲望、激情、理智以及恐惧都是人类行为的重要动因。现实中，人的行为由四者的相互交织驱动。人类政治秩序历史的复杂动力，肇生于各式动机的驱动和混合。<sup>②</sup>

在勒博看来，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根植于欲望，现实主义则强调恐惧，而激情的重要性在现代却被忽略。他于是主要讨论了激情对行为和秩序的影响，强调对激情的失衡追求比对欲望的失衡追求更容易导致失序，将激情置于价值中心的社会更容易陷入战争。勒博构建了一个激情基础上的政治范式，并旁征博引上自古希腊下至伊拉克战争的历史事实加以佐证。《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打破了以往心理学从微观层次解释国际现象（主要集中于对具体外交决策的分析）的局限，将之应用于对国际秩序进程的宏观思考，同国际关系理论主流范式直接对话，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

《国家为何而战？》是“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的具体应用。与大多数研究关注战争的直接缘由不同，勒博聚焦于什么是战争背后的“基本动力”。建立在激情、欲望和理性三种人性动因基础上，勒博认为，地位、安全、报

---

① “激情”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语的“thumos”。对该词的翻译，学界已有辩论，尚无一致意见。相关讨论参见刘小枫主编：《血气与政治》，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笔者感谢邓好雨提示这一点，参见邓好雨：《社会科学与政治哲学之间：评勒博〈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国际关系理论课程论文（未刊稿），2010年，第3页。

② Richard Ned Lebow,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apter 2-3. 国内学界对该书的评论参见邓子立：《国际关系的社会心理学——评〈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载《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2期，第146~160页；邓好雨：《社会科学与政治哲学之间：评勒博〈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陈玉聃、唐世平：《国际关系的重新发现人性》，载陈玉刚、唐世平主编：《知识社群与主体意识——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9~81页。

复和物质利益这四种主要动机驱使国家走向战争。其中，利益来自于欲望，激情衍生出对荣誉和地位的追求以及报复倾向，而恐惧作为一种情绪则推动了对安全的欲求。<sup>①</sup> 虽然安全和经济利益主导着现阶段对于战争起源问题的思考，勒博却强调激情发挥了更主要的作用。他指出，激情产生自尊，其实现需要赢得其他重要团体的承认。这种动机非常强大。人和国家一样，往往会牺牲财富或者安全来追求自尊。一方面，荣誉和地位等级森严，具有高度的竞争性，更容易导致国家间的冲突，且难于协调。另一方面，对荣誉和地位的追求也使得国家更愿意承担战争的代价和风险。勒博由此推断，对于地位的追求和复仇心态是推动国家走向战争的主导型原因，并提出了六个相关命题。<sup>②</sup>

为论证这些命题，勒博建立了全面的数据库，其范围覆盖了 1648~2008 年间有崛起国、主导国和大国参与的阵亡人数超过 1000 人的战争。数据统计（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计量分析）显示，几个世纪以来，地位、荣誉或复仇的欲望（勒博认为复仇是激情的一种体现）加在一起，解释了数据库中 68% 的战争动机，而恐惧和安全仅仅分别解释了 18% 和 8% 的战争（这一发现是惊人的，因为勒博在编码过程中还有意识地优先考虑地位以外的动机）。勒博由此总结指出：对于地位的考虑以及报复是国家发动战争的首要动因，而安全需要和经济利益不过是战争的次要原因。勒博还发现，与权力转移理论相反，主导国和崛起国之间并不倾向于相互攻击，相反，它们都倾向于攻击弱小的第三国和正在衰落的大国。同时，战争的发动者在赢得战争上并不具有优势。1945 年以来，战争的发动者只赢得了不到三分之一的战争。他认为，对于这一现象，除了以往学者提出的意外和误判，还有更深层的缘由，必须从心理动机来解释。与之相关，不少战争源于复仇，这些战争的发动者通常是衰落的大国和弱小国家，且它们基本上都输掉了战争。勒博认为，复仇来源于激情，是很重要但非理性的动机。最后，勒博还强调，战争动机的分布并不稳定，而是经历了历史性变化。诱发战争的主要动机已改变了原来的含义，并且通过战争之外的方式得到体现和满足。国家间的战争在减少。<sup>③</sup>

---

① 值得注意的是，勒博并未将恐惧—安全支配下的世界归结于现实主义者所主张的无政府状态，而是归结于精英缺乏约束而导致的失范。参见理查德·内德·勒博：《国家为何而战？》，第 86~88 页。

② 限于篇幅，此处不再展开讨论，具体讨论参见理查德·内德·勒博：《国家为何而战？》，第三章，第 67~95 页。

③ 理查德·内德·勒博：《国家为何而战？》，第 112~126、160~163、181~183、189~191、198~216 页。

勒博的论断令人耳目一新，并且通过原创数据集合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评估。这对近年来陷入停滞的战争研究造成不小冲击，特别是动摇了传统研究在个体单元层面的逻辑基础。当然，勒博的动机—秩序—战争研究并非完美无缺。作为学术研究，它要面对诸多严格的理论逻辑审查与研究设计批评。本文将从两个方面对其进行质疑：首先是理论构建中的矛盾与疏漏，其次是研究设计中的缺陷与不足。

## 二、对心理动机解释的质疑

《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和《国家为何而战？》出版之后，在学界已引起了一些批评。首先，不少学者认为，勒博论点的最大缺陷是他过分突出了文化精神因素，特别是激情—地位动机的作用，有可能陷入战争研究中经常出现的“单一动因的陷阱”。<sup>①</sup> 笔者认为，这种批评过于简单。如果勒博的意图仅仅是讨论战争背后的深层动机分布（勒博一再强调自己有限的理论意图），则其论述存在的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要进而对战争的起源做出完整解释（勒博有时似乎又流露出这种企图），则确实要面对不小的质疑。战争是一种政治手段和政治行为，没有动机/目的的手段和行为难以想象。有关战争起源的研究，确实离不开对人类进行这种集团间暴力的深层动机的探讨。但是，战争又是一种社会后果，对于理解战争起源及其频率变动而言，仅仅依靠个人层次的动机探讨是远远不够的。对于这一点，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等人早有论述，勒博自己也有所注意，虽然其处理确实不够完善。<sup>②</sup>

与之相关，勒博对于荣誉等人性动机与战争之间的关联机理讨论也不充分，存在着一些逻辑漏洞。例如，他区分了平衡的和失衡的这两种对激情的追求，强调战争的主要心理动机是对激情的不平衡追求。这确实比传统的心理解释更具弹性，但是涉及如何判定对欲望或激情的追求是平衡还是失衡的问题，勒博的简短讨论在《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中语焉不详，在《国家为

---

① 陈玉聃、唐世平：《国际关系的重新发现人性》，第 81 页。

② 肯尼思·N. 华尔兹：《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这背后存在着深刻的社会科学哲学问题，参见 Shiping Tang, “The Objects of Social Sciences: Idea, Action, and Outcome (From Ontology to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unpublished manuscript, Fudan University, 2013。

何而战?》中亦未见深入。相关讨论给人循环论证的印象。<sup>①</sup>要理解战争的原因,还必须考虑战争动机与战争行为间复杂的社会政治进程。勒博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较为跳跃,而它们正是其所批评的主流研究所关注的问题。只不过后者的讨论主要是基于恐惧和欲望的动机展开,需要在激情作为基本动机的前提下加以重新检讨。在勒博的激情动机理论与传统的有关权力—利益等因素的研究间开展对话,应该是有意义的探索方向。

其次,很多评论者指出,勒博在个体动机与集团倾向间的过渡缺乏足够的论证。国家虽是人的造物,但毕竟不是人。如何才能证明个人层面的灵魂—心理与社会—国家的秩序具有同质性(homogeneity),进而能可靠地从个体特性推论到集体倾向?个人心理追踪的办法能否被正当地应用到集体政治单元的心理研究之上?这是几乎所有国际关系心理学解释所要面对的质疑。在古希腊哲人那里,人有什么样的人性,城邦就有什么样的特性。但是,在现代社会科学语境下,从个体动机到集体动机进而推及到集体行动及其结果,其中的传导链条需要论证。在书中,勒博主要诉诸民族主义的传递机制,其理由是,国家代表特定政治精英或公民行事,人民时常会将自尊等需求映射于民族国家,并因为国家的成败而感到欣喜或羞辱。但是,必须承认,这其中的联结可能并非那么简单、稳定和有效,存在不少有待深入讨论的问题。<sup>②</sup>同时,勒博还强调人类动机的混合构成。由此,就需要进一步回答如下问题:不同的个体在动机构成上是否存在差异?多样的个体特性如何聚合成为集体特性?其传导机制如何?不同的集体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最后,还需要区分国家和社会,国家倾向可能不同于社会倾向。这些都有待深入探讨。正如霍尔斯蒂(K. J. Holsti)所言,勒博将个人特性与政体联系起来,继而将之与国际体系秩序联系在一起,这是大胆的尝试,也是理论上的冒险。<sup>③</sup>

此外,勒博的另一个容易引发争议的观点是其对战争未来趋势的预测。<sup>④</sup>

---

① 理查德·内德·勒博:《国家为何而战?》,第37~41页。

② 同上,第91页。前引各篇书评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这个问题。

③ K. J. Holsti, "Richard Ned Lebow's A Cultural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65, No. 4, 2010, p. 1069, 参见余潇枫:《导读:透视国际关系的“文化之维”》,载理查德·内德·勒博:《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第9~10页。

④ Christopher Coker, "Why Nations Fight by Richard Ned Lebow",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ugust 12, 2011, <http://www.ethicsandinternationalaffairs.org/2011/why-nations-fight-by-richard-ned-lebow-full-text/>.

预测一向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争议话题，以致于今天越来越多的著作选择淡化或回避。<sup>①</sup> 勒博则用大量的篇幅阐述了其对战争未来走向的展望。在他看来，由于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和文化变化，国家对于荣誉的界定也发生了变化。在当今时代，战争和武力的使用除非是出于自卫或者广为接受的道义目标（如制止大屠杀），它们事实上会降低而非提高国家的荣誉。相反，国家对地位的追求能够通过一系列其他办法得到满足，而不再需要诉诸武力。基于这些认识，勒博不无保留地预言：国家间的战争将会消减。

但是，这一预测本身却同勒博的理论命题存在微妙紧张。假如像勒博所认为的那样，一方面，战争主要是由于激情因素（自尊动机与愤怒情绪）所引发，另一方面，作为限制性因素的有关战争的成本—收益判断以及对于荣誉的界定在历史上各有消长，那么我们又如何相信当前状况不会只是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的一个小波动呢？<sup>②</sup> 如果“激情”作为深植于人类本性的战争动机是稳定的话，那么我们如何相信过去百年间所发生的变化具有如此大的效力，以至于对激情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塑造和控制？如果人的本性动机真的重要，那么要真正地抑制战争，是不是还需要人类动机或者说人性深层的某种社会演化，例如“利他”与“同情”动机的出现？<sup>③</sup> 或者，如果激情等各种动机是可以塑造变化的，如勒博提出的，战争减少趋势的关键是国际社会对激情、荣誉和地位的重新界定，那么由此而来的追问便是，这种再认识与再界定从何而来？这些变化是内生于勒博的三种动机，还是由外生因素引起？勒博自己也承认，如果战争动机的分布并不稳定，那么荣誉和地位的启示就是有限的。人们难免追问，荣誉等基本动机到底只是有待填充渲染的空壳，本身并无稳定确实的内涵，还是一个独立充分的解释变量？换言之，勒博所论证的各项基本动机，能否构成探讨战争原因不可还原的逻辑起点？

最后，地位和荣誉是战争关键动机的论点本身新意不足。对于勒博的核心概念“激情”，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者们并不陌生。福山（Francis Fukuyama）“历史终结论”的核心概念就源于同一个古希腊政治哲学概念（thu-

---

① 陈定定、刘丰：《认真对待预测：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预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期，第19～33页。

② 理查德·内德·勒博：《国家为何而战？》，第115、180、218页。

③ William J. Long, “Why Nations Fight—By Richard Ned Lebow”,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34, No. 1, 2013, pp. 145-146.

mos/thymos)。<sup>①</sup> 历史学家们的不少著作已经涉及到勒博所言的荣誉因素在特定战争中的作用，虽然未必使用相同的概念；<sup>②</sup> 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已经大量讨论了动机与情绪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经济学与社会学学者同样讨论了与荣誉相关的位置性物品等概念。<sup>③</sup> 即便在国际关系领域，勒博的命题也不算新颖。林瑞谷（Eric Ringmar）在其1996年出版的《身份、利益和行动：对于瑞典介入三十年战争的文化解释》中，就已出色地论证了瑞典参加三十年战争的主要动机在于将之视为提升自身地位的一种方式。<sup>④</sup>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欧洲社会心理学社会身份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的启发下，以默瑟（Jonathan Mercer）等人的研究为代表，关注内群体合作和外群体歧视，从声誉、地位、身份竞争与社会承认角度解释冲突和战争起源的成果正越来越多。<sup>⑤</sup>

可以说，人性正在重新成为社会科学研讨的焦点。无意贬低古希腊哲人的智慧，杰维斯（Robert Jervis）在关于《国家为何而战？》的书评中就指

<sup>①</sup> 福山言说的基础是从俄裔法籍学者兼政治家亚历山大·科耶夫（A. Kojève）处继承的一种经过再阐释的黑格尔“主奴辩证法”。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一书结尾，福山并没有如某些政治学者批评的那样，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而欢呼，而是对这一胜利所意涵的人类政治历史的停滞发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呐喊。Francis Fukuyama, “Reflections on the End of History, Five Years Later”,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4, No. 2, May 1995, pp. 27-43, 参见邓好雨：《社会科学与政治哲学之间：评勒博〈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

<sup>②</sup> 耶鲁大学的知名学者卡根（Donald Kagan）就在其对于战争的研究中将荣誉列为三种推力之一。参见 Donald Kagan, *On the Origins of Wars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Peace*, New York: Doubleday, 1995; Avner Offer, “Going to War in 1914: A Matter of Honor”, *Politics & Society*, Vol. 23, No. 2, 1995, pp. 213-241。

<sup>③</sup> 参见 Fred Hirsch, *The Social Limits to Growt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sup>④</sup> 参见 Erik Ringmar, *Identity, Interest and Action: A Cultural Explanation of Sweden's Intervention in the Thirty Years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勒博本人在书中还列举了其他一些研究，参见理查德·内德·勒博：《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第19~20页。

<sup>⑤</sup> Jonathan Mercer, “Anarchy and Ident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2, 1995, pp. 229-252; Jonathan Mercer,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 “Short Cut to Greatness: The New Thinking and the Revolution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7, No. 1, 2003, pp. 77-109; Deborah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 “Status Seekers: Chinese and Russian Responses to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4, 2010, pp. 63-95; Thomas Lindemann and Erik Ringmar, ed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Boulder: Paradigm, 2011; William Wohlforth, “Unipolarity, Status Competition, and Great Power War”,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2009, pp. 28-57.

出，当代心理学前沿研究对于情绪和理智的理解虽然不一定与古希腊有关精神和欲望的概念相抵触，但更能切实到位地提升我们对于二者如何彼此互动影响的理解。一个可能的疑问是，勒博是否一定要把自己的观点建立在古代经典之上？<sup>①</sup>当然，与以往以自尊、荣誉和地位为核心的研究相比，勒博对于人类行为基本动机的讨论确实更加深入全面，考虑到了动机的多样性，特别是系统地发展出理论假说，并建立起原创性的有关战争动机的数据库来支撑自己的论点，而后者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 三、对研究设计疏漏的批评

勒博构建了一个覆盖范围广泛的数据库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可以说，这个数据库的构建本身就是不小的学术贡献。然而，如果仔细检视，仍会发现一些值得检讨和改进的问题。

首先，勒博佐证其论点的经验数据范围仅限于已经发生的战争。这是否构成了方法论上典型的选择偏误（selection bias）？<sup>②</sup>笔者认为，如果仅限于发现和探讨国家发动战争的动机，则此种设计问题不大，但如果应用于对战争原因的理论解释，就必须警惕。勒博数据库“选择偏误”的更大可能是在另一个层面。勒博在论述中曾强调，强国有着更明显的荣誉动机，唯有强国才会感到最深切的屈辱，而弱国则不会如此。在构建数据库的过程中，勒博主要考察的也是那些由主导大国、崛起国或大国参与的战争，其样本范围的完全性也就存疑，使其说服力大打折扣。它很难说明荣誉动机是否普遍适用于不同类型的国家或其他战争形式。从某种程度上说，勒博所设计的数据库最多只是描述、展示了其理论命题，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对于假说的计量检验。

其次，就研究战争的动机而言，勒博编码时所用的五个类属——地位、安全、报复、利益及其他——并没有明确一贯的界定，且没有满足互斥性要求，与六个命题的关系也不很清楚。例如，勒博没有明确说明其在操作时是

---

① Robert Jervis, “Fighting for Standing or Standing to Fight?” *Security Studies*, Vol. 21, No. 2, 2012, pp. 336-344; Jonathan Mercer, “Emotional Belief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4, Issue 1, 2010, pp. 1-32; Rose McDermott, “The Feeling of Rationality: The Meaning of Neuroscientific Advances for Political Scienc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2, No. 4, 2004, pp. 691-706.

② Dan Chen, “Review on *Why Nations Fight*”,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7, Issue 1, 2013, pp. 120-121.

如何将地位从利益中排除出去的。勒博也承认，当国家发动或参与某场战争时，其动机通常是复杂的。在战争爆发的过程中，各种不同的动机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例如，领土征服既可以是地位的宣示，同时也能够带来额外的人口和资源。安全与财富可能是最为直接的动机，但其之所以被追求很可能主要是因为它们能够带来荣耀和地位。同样，对于荣耀和地位的追求也可能是为了更方便地增进财富和安全。虽然类似事例能够被同时编码到两个或多个类别里——如同勒博对一些案例所做的处理那样——但如此处理毕竟是有缺憾的。

再次，勒博数据库里有关战争发动者、动机及战争结果的编码都较为主观，其中不少可能存在学术和政治上的争议。勒博本人参与并主导编码过程更削弱了数据的客观性，更合适的做法应该是召集一群专家根据勒博的分类标准进行编码。不过即便如此，这一设计背后深刻的认识论问题依旧存在。无论例证叙述如何试图冷静平实，仍然存在着理念负载。材料本身也不会自己说话，它依赖于人们的解读。而对某个案例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战争起源已有的认知。仅对具体战争起因的理解可能影响到对战争起源问题的综合判断，而且这种综合判断本身也可能影响到我们对各个具体案例的理解。不可避免的是，政治学者和历史学家们会对某些战争的缘起有着不同有时甚至是彼此冲突的解读。这进一步影响到数据和相关检验的可信度与可靠度。<sup>①</sup>

同时，勒博的数据库考察了数量众多的战争。虽然有着数十年深厚的研究积累，但这种考察范围决定了他不可能对其中的每场战争都给出充分到位的分析。仔细阅读不难发现，勒博在论述过程中显露出的某些思考和推理逻辑也令人怀疑。例如，他在不少地方暗示，战争的发动者经常失败，这种“误判”并不是因为缺乏信息，在更多情况下是因为领导人在诉诸武力前不能够认真地权衡战争成本。勒博将这种失败归结为激情、荣誉和复仇等心理上的原因。<sup>②</sup> 必须指出，这样的推理未免太过武断。理性选择理论的拥趸会反驳说，国家也可能“理性地”冒险，参与一场失利概率更大的战争，甚至发动一场确定要失利的战争。因为就理性分析而言，发动战争的期待效用与机会成本，而非战争的胜负本身，才是国家考虑的核心。一个预期自己更可能会失利的国家也可能主动挑起战争，只要它认为一旦获胜收益足够大而失

<sup>①</sup> 理查德·内德·勒博：《国际为何而战？》，第43～44页。

<sup>②</sup> 同上，第122～123页。

利的代价相对小，战争的期待效用还可能是正的。甚至即便战争的期待效用是负的，国家也依然有可能发动或参与战争，因为不打仗的结果可能更糟或者其他的选择（如强制下的外交妥协）代价更大。弱者完全有可能通过选择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通过展露自己的决心来吓阻强者。这些讨论都说明，勒博的数据库并不是完美的，其编码过程可能存在不少偏差。我们在进一步发展和应用勒博的数据库时，必须对之进行审慎的检讨。

最后，勒博自己也认识到，诱发战争的因素是复杂的，各因素间存在着非线性交汇，而且，诱发战争的因素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所以统计研究不能很好地说明问题，或者根本就不能说明问题。然而，他正是用这一方式来对自己的六个命题加以论证的。勒博在批评战争的相关性研究时还指出了战争数据库构建的两大难题：案例的可比性和独立性，<sup>①</sup>但是，其本人的处理恰恰就是将所有的战争案例等量齐观，而没有考虑不同战争在规模和性质上的差异。对于具有明显关联性的几场战争（如几次反法同盟战争等）的处理也未作说明。杰维斯曾就此批评道，对于两次世界大战，勒博就认为地位并不一定是支配性的动机。那么，我们有理由追问，为什么不同的战争其动机不同，为什么这些最大规模的战争中，其他动机的重要性反而更能得以体现。<sup>②</sup> 勒博在处理具有复杂动机的战争案例时，简单地在不同的类别各计一次的处理方式，并不能照顾到不同动机间重要性程度的差异。换言之，他的数据库或许能让人接受激情是发动战争更普遍动机的说法，但普遍的动机并不一定是最强有力的动机。<sup>③</sup> 这些问题都需要以后的研究在利用和扩展数据库时加以注意和解决。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质疑并不构成对勒博学说的根本挑战。事实上，勒博清醒地反省了自身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在其论述过程中展现出了令人钦佩的智识真诚。而且笔者认为，勒博研究设计的不足从根本上来源于这类社会基本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在这类问题面前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回避和忽略那些复杂而重大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执拗于那些僵化的方法论规则，才导致了当前美国学界对那些难以操作化的“含糊”却极重要的问题的“遗忘”。<sup>④</sup> 除了其理论命题，《国家为何而战？》同样值得注意的地方

① 理查德·内德·勒博：《国际为何而战？》，第12、54页。

② Robert Jervis, “Fighting for Standing or Standing to Fight?” pp. 336-344.

③ 理查德·内德·勒博：《国家为何而战？》，第12页。

④ 邓好雨：《社会科学与政治哲学之间：评勒博〈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第2页。

恰恰是勒博对于各种认识及方法论难题与解决之道的自省与探讨。<sup>①</sup>

除了理论逻辑与研究设计上的疏漏，勒博的论述还存在一些疏失，留下了不少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例如，勒博在《国家为谁而战？》中对于欲望和理智的处理是相当不充分的。即便是在《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一书中，也遗留下了不少疑问。<sup>②</sup> 相比之下，勒博更加注重对于精神的讨论，但同样有失简单。有关荣誉的社会进程是复杂的，比如存在勒博所言及的“亚文化”甚至“反文化”。对于某些人或者某些社会群体（包括国家）而言，他者的尊重与社会的认可并非获得良好自我感觉的唯一途径，标新立异、与众不同，甚至是对抗性的姿态都可能成为激情与自尊的表现。社会身份理论中有关社会对抗和社会创造机制的讨论在此会有启发。<sup>③</sup> 不同个体和群体对于荣誉与尊严的定义可能并不一致。在某些受众面前获得荣誉和地位的举动在另一些受众那里可能得不到同样的反馈。勒博注意到了这种复杂性，并且在不同的地方有所涉及，却未能系统细致地加以讨论。同样，勒博也提到，荣誉未必就会导致冲动、竞争和冲突，某些情况下它也可能导向自我克制。一些对地位的追求是竞争性的，容易导致冲突，而另一些则并非如此。国家之间有关地位和荣誉的竞争可能被引导到更加具有建设性的轨道上，其结果是开放性的。在此意义上，是哪些因素和机制影响到人们对于荣誉、理智和欲望的界定和调适，对荣誉的追求到底是导向冲突还是合作，如何才能使其发挥正面的作用，都是有待学者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话题。<sup>④</sup>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将激情—荣誉动机“找回来”之后，对上述这些

<sup>①</sup> 当然，这并非该书的主题，勒博的论述也很简略，关于该问题的更多论述参见 Richard Ned Lebow, *Forbidden Fruit: Counterfactual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限于篇幅，对于该问题我们也只能另择他处加以讨论。

<sup>②</sup> 例如，基本动机到底是三种还是四种，恐惧是否构成一种基本动机，勒博在各处的讨论并不一致。同样不清楚的还有理智的作用，即它到底是一种具有独立地位的基本动机，还是仅仅通过对欲望和精神进行约束和导引，从而产生审慎和自制？对于国家间是否能够发挥理智，实现哈贝马斯意义上的有效沟通与商谈秩序，勒博也未作讨论。同样，他对于欲望的界定也显得不够精确，似乎将之简单地等同于对财富的占有。

<sup>③</sup> Henri Tajfel and John C. Turner,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group Conflict”, in William G. Austin and Stephen Worchel,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Monterey, Calif. : Brooks/Cole, 1979, pp. 33-47.

<sup>④</sup> Deborah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 “Status Seekers: Chinese and Russian Responses to U. 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4, 2010, pp. 63-95. 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参见尹继武：《和谐世界秩序的可能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5期，第56~65页。

与之相关的问题的深入追问不仅具有理论价值，对于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的某些现实难题也具有较强的启发意义。以下将以当前东亚的身份与情感政治为例如加以说明。

#### 四、荣誉动机、身份纠葛与东亚秩序：引申性讨论

近来，东亚各国间出现了不少政治摩擦，同时，民间的不信任与相互恶感有所上升，一度为人期待的东亚共同体构建困难重重。对于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人们有不同的判断。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大国间的相互核威慑与美国所主导的同盟安全保障体系的存在构成了东亚和平相对稳固的基础，在此意义上，各国民的安全困境依然可控。<sup>①</sup>另一方面，日渐广泛深入的经济与社会交往及相互依赖并没有消除彼此间的“恶感”与“排斥”情绪。建立在安全恐惧与利益欲望基础上的主流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这就需要我们从荣誉动机以及身份承认的角度探究当前东亚秩序与共同体建构的问题。

基于勒博的荣誉动机学说、林瑞谷等人的“身份承认”命题，以及社会身份理论的相关讨论，我们或许可以提出这样的见解：当前东亚国家间关系的突出矛盾（以及东亚集体身份构建的核心障碍）在于各国在国家荣誉的界定、追求与相互承认的过程中存在诸多不相容之处。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各种原因，它们各自承担了对方现代民族国家心理形成的参照系与评判者的角色，相互卷入了各自民族心理形成的历史进程，历史与现实的纠缠构成了东亚身份政治的复杂性。在历史遗产与西方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处在民族国家的构建阶段，由于各自独特的情境与“单边”式的构建策略，各国对于自我身份积极性的界定，对于国家荣誉与尊严的追求，彼此难于相互承认，反而经常性地出现冲突与不协调，构成了东亚共同体集体身份构建的关键障碍。

其中最突出的例子便是对地区秩序构成重大挑战的日本对于“正常国家化”与“政治大国”的追求。这种追求来自于勒博所说的“激情—荣誉”动机。右倾保守化思潮在日本社会兴起并日益占主导地位的根本原因，是日本社会经历战后经济高速增长与近二十多年来的停滞衰退的涨落起伏之后，重新界定日本国家荣誉的需要和对“先进性”的追求，是在一个日益个人主义

---

<sup>①</sup> 参见阎学通：《东亚和平的基础》，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3期，第8~14页。

的社会中，重新树立国民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以保证有效的社会统合与国家发展的努力。<sup>①</sup> 而在美国地区霸权地位并无改变及中国正迅速崛起的背景下，日本依旧无法对美国“说不”。于是，日本向“政治大国”迈进的荣誉目标设定，更多地倾向了“西方一员”的角色，同时更多地试图通过修正历史认识以及实现自我武装等方式来实现“正常”与“大国”的自我证明，并因此被中、韩等国视作挑衅与威胁，由此造成了其与中、韩等国家在身份与情感上日渐严重的对立。除了历史问题，中日钓鱼岛争端和韩日独岛/竹岛争端也越来越难以妥协，甚至连承认争议的存在都变得困难，背后也不乏荣誉尊严的考虑。显然，这些争端不仅仅在于其潜在的战略安全机制与海洋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它们触动了与历史记忆相关的敏感神经，被与国家尊严相联系，因此，政府或难以进行外交谈判与交换。当这些议题被某些政客或政治势力有意识地加以操作利用时，就很容易煽动与裹挟民众情绪，牵连其他议题，从而影响国家间的和解进程。

同样，当前存在于中韩两国间的民众对立情绪，很大程度上也同荣誉动机有关。过去几年间，“东北工程”中有关古代高句丽王国的历史归属研究以及韩国一系列“申遗”事件（包括相关虚构传言）所引发的争议就是突出的例证。在中国学者看来，由于韩国与中国的特殊历史关系、地缘政治上的“夹心”地位以及近代被日本殖民的历史，在现代转型与民族集体身份构建的过程中，对于尊严的执拗激发了韩国民众“想象的悲情”，并且以否定、扭曲和虚构历史的方式表现出来。同时，韩国在民族认同问题上对历史的选择性叙述，却又不可避免地使中国民众感觉自身的历史自豪感受到冲击，从而引起一系列反弹，成为中韩两国间在存在诸多共同战略与经济利益以及频繁往来的背景下，民间对立情绪依旧挥之不去，甚至几度激化的关键原因。<sup>②</sup>

关于上述问题出现的原因，除了注意荣誉抱负的动机，我们还应该重视东亚国家间身份纠葛的两个关键背景。首先是“中华（华夷）意识”与“朝贡秩序”的复杂遗产。就其理念而言，所谓的“天下体系”，包含着亲疏有别的关系差序格局，有着强烈的自我族群中心色彩，隐含着对于“中心”的争夺。就其历史而言，地理甚至政治上的“近”并不意味着心理上的“亲”。

---

① 参见李寒梅：《日本民族主义形态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

② 参见李扬帆：《身份认同：韩国对中韩历史的选择性叙述与中韩关系》，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 年第 1 期，第 44~60 页。

特别是随着明清易代与西方思想的冲击，东亚各国早已渐行渐远。而当“亚细亚”等身份由于种种原因在不同的背景下被重新唤起之时，对于“谁是中心（中华）”的争夺也开始浮出水面。<sup>①</sup> 某种意义上，东亚各国从未设想出一种集体秩序组合，在其中，各方能够真正地彼此平等相待。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东亚“集体身份政治”的基本背景是“西方”如影随形的存在。在“西方”依旧居于强势地位的情况下，东亚这一可能的集体身份属性似乎很难设想并提供某种有力的“优越感”——既能为各国民众所共同接受，又能满足民众对于荣誉和尊严的诉求。东亚各国的“荣光”依旧是以西方为样板和参照界定的（甚至可以说是由西方直接评判的），并在本区域产生影响。“东西”间时常纠葛不清。某国在面对西方时所经历的挫折，经常性地转化为寻求自身在“东亚内部”优越感的努力，试图以凌驾邻国的方式来维护本国的“自尊”。这也构成了集体身份形成的另一个基本障碍。

总之，在“华夷理念”的历史遗留与强势西方潜在压力的背景下，东亚各国各自承担了对方现代民族国家心理形成的参照系与评判者的角色，相互卷入了各自民族荣誉心理形成的历史进程，由此构成了东亚身份政治的复杂性。特别是东亚各国“大国”身份抱负承认的不相容，制造了不少不必要的摩擦，从而间接地印证了勒博等人的理论。而要减少战争与冲突的可能，如勒博等人所言，就有必要调整对于国家荣誉和积极身份的定位。东亚各国应当努力谨慎地处理历史与地缘文化造成的纠葛，提高各国荣誉身份之间的相容性，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宽容、忍耐和承认彼此的身份关切，和谐共处，而不是在身份对立的漩涡中越陷越深。

## 五、结 论

冷战结束以来，对理念、文化与心理因素的考察在国际关系学界受到重视。勒博从人性动机与社会心理角度建构的国际关系的宏理论，突破了以往心理学仅仅从微观层次解释国际现象的局限。过去，国际关系中的心理学应

---

<sup>①</sup> 参见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载《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1期，第29~58页；葛兆光：《渐行渐远——清代中叶朝鲜、日本与中国的陌生感》，载《书城》2004年第9期，第46~50页；李扬帆：《涌动的东亚——明清易代时期东亚政治行为体的身份认同》，载《国际政治研究》2010年第3期，第126~150页。

用主要存在于两个领域，即国际冲突的心理学解释以及决策层次的心理学解释。与这些研究相比，勒博从人性心理角度提出国际关系新的核心概念和机制逻辑，构建了一个全新范式，并将之应用到国际合作、冲突与秩序的讨论，充分说明心理学的贡献不仅表现在解释那些偏离于理性的案例，而且能够发展出一套独立的宏大理论，从而改变国际关系的理论与政策研究议程。

在此意义上，《国家为何而战？》的最大价值并不在于其提出了哪些有关战争原因的具体命题，而是它从人性动机的维度对已有研究构成了根本性冲击。所有的社会理论必须对人性做出某些假定，以此作为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同时，对逻辑起点的修正势必带来理论思路和分析议程的重大调整。通过对于普遍根本动机的探讨，勒博将人性重新引回到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战争起源分析的中心，促使我们对已有的思考范式与理论进程进行反思。我们知道，以往的战争研究是在利益—安全亦即欲望—恐惧的动机框架下进行的。如果这一动机基础被打破，那么，这些因素和机制的作用就需要被重新审视，对各种物质及精神层面的结构要素与机制进程的判断也必然要有所修正和改变。例如，前景理论在国际关系、特别是冲突与战争的研究中正日益受到重视，但正如勒博所指出的，这些研究是在欲望—利益的框架下进行的，而如果我们将动机转向激情—荣誉，则国家的风险偏好会出现实质性差异。<sup>①</sup> 虽然表面上勒博不过是重复了国家对荣誉和地位的追求容易导致战争的命题，但事实上，通过对基本动机的再检讨，勒博对主流战争研究的基本前提构成了致命挑战，使得那些传统结论有可能被颠覆而必须重新检讨。在笔者看来，勒博或许正是有意识地选择战争原因这个经典命题，采取统计分析这种当前的“主流方法”来展示其“国际关系文化理论”的重要意义：它可能会重新界定战争起源的研究议程。我们前面所论及的各种缺憾和问题，也就成为下一步可努力的主要方向。

总之，勒博的研究充分表明，对人类行为基本动机的探讨如何为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政策讨论开辟了新的天地，包括在此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种种挑战。在《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中，勒博曾引用尼古拉斯·雷舍尔（Nicholas Rescher）的说法：认知的改变，“不仅涉及已知的事物，而且涉及可以被探究的事物”。<sup>②</sup> 勒博认为，判定其框架和相关理论，应当以此为标准。就此而言，无论是《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还是《国家为何而战？》，无疑都是成功的。

<sup>①</sup> 理查德·内德·勒博：《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第425～426页。

<sup>②</sup> 同上，第94页。